



中国历史
研究丛书

中国近代史 专题研究述评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尹凤阁

中国历史研究丛书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

ZHONGGUO JINDAISHI ZHUANTI YANJIU SHUPING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印张 358,000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800

书号 11001·730 定价 2.45元

目 录

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	龚书铎 谢 维 孙燕京 (1)
太平天国史研究述评·····	茅家琦 (25)
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	夏东元 刘学照 (57)
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述评 ·····	戚其章 (118)
戊戌变法史研究述评·····	孔祥吉 (160)
义和团史研究述评·····	路 遥 (207)
清末立宪运动史研究述评 ·····	侯宜杰 (261)
辛亥革命史研究述略·····	刘望龄 严昌洪 朱 英 (298)
孙中山研究述评 ·····	段云章 周兴梁 (351)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评述 ·····	宓汝成 (386)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述评 ·····	靳良永 (418)
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研究述评·····	蒋 俊 李兴芝 (443)
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述评 ·····	张 璞 (462)

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

龚书铎 谢 维 孙燕京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撰写的文章中,对鸦片战争的性质作了科学的论断,指出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不义的战争,热情赞颂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反侵略斗争。这些精辟论述,对研究鸦片战争史具有指导意义。

对鸦片战争的研究,还在它发生后不几年就开始了。当时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企图通过检讨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来总结经验教训,以求“制夷”之道。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纪》、夏燮的《中西纪事》等,可以说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尽管还不可能作出科学的阐述和结论,但它表现出来的爱国思想是值得称道的。

至于外国资产阶级和中国的买办文人则极力歪曲鸦片战争的性质,为英国侵略者开脱侵华的罪责,把这次战争称之为“通商战争”,把侵略说成是传播西方文明的“友善”行动。历史在他们那里,完全被颠倒、被混淆了。

也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虽然认为英国对华发动的鸦片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由于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却把战争的发生归于中国“通商制度之不合理”,“中国官吏知识之幼稚”,以及林则徐在禁烟问题上不谙外情,操之过急。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是持批评或否定的态度的。这种错误的观点,不可能正确地阐明鸦片战争的历史。

解放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些史学家如范文澜、胡绳

等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鸦片战争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具有开创性的论著。但是，由于当时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样的成果为数还不多。

建国以来，鸦片战争史的研究虽然没有像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课题的研究那样“热门”，但也不像有些事件那样过于冷清。三十五年来研究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书籍有三十种左右（中国近代通史性的书籍没有计入），资料书十余种，文章六百余篇。这些成就，体现了广大近代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大致反映了鸦片战争史研究的现有水平。

这里着重就建国以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作一概述。

一

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同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在三十五年里，虽历经了起伏曲折的过程，但就总的趋势来说，是不断向深广发展的。

解放后至六十年代中期，鸦片战争史的研究，由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关于鸦片战争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这个领域占支配地位，所以较之解放前，有着根本的变化。

第一，正确论述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战争的性质，指出这次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扩展经济的支配势力借以奴役中国人民的一次侵略战争，英国保护鸦片贸易，阻挠中国禁烟是引起战争的直接原因。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反侵略的正义战争^①。这

① 齐思和：《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烟贩们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主谋》，《光明日报》1953年6月27日；丁名楠等：《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1954年第1集；姚薇元：《论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就矫正了以往资产阶级学者所制造的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说法。

第二，改变了旧史学轻视以至否定人民群众的弊病，注重研究、论述三元里以及东南沿海人民群众在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斗争，指出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自发武装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声，显示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和敢于同敌人斗争的英勇气概，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同时，对于爱国官兵浴血抗战、英勇牺牲的精神也给予称颂赞扬^①。

第三，纠正了旧史学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原因的问题上所散布的“唯武器论”、“必败论”等唯心主义的谬论，阐明失败的关键在于清政府腐朽的封建统治，在于清政府对内反人民对外屈服投降的反动政策，英国的“坚船利炮”和清军武器的陈旧落后，虽然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②。

第四，通过对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变化的分析探讨，阐明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这个社会，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也没有确立独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它具有自己的特点。由于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也跟着发生变化，

① 孙志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反英斗争》，《历史教学》1965年第2期；刘恢祖、华世珍：《1840年上海抗英战争》，《学术月刊》1960年第12期；蒋顺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江苏人民的自发抗英斗争》，《新华日报》1962年8月7日；陈家平：《鸦片战争中的浙江“黑水党”》，《历史教学》1963年第6期；蔡如金：《鸦片战争时期厦门军民的抗英斗争》，《历史教学》1964年第2期；高鸿志：《关于乍浦镇之役的旗军》，《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陈锡祺：《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陈原：《略论三元里反侵略斗争》，《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

② 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牟安世：《从鸦片战争看胜败的因素是人不是武器》，《人民日报》1965年10月11日。

中国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任务^①。此外，还有的文章专门讨论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经济^②。

第五，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仅纠正了以往旧史学为投降派琦善、耆英等开脱罪责的谬误，肯定了主战派林则徐、关天培等的爱国行为，而且对一些人物作了逐步深入的研究。其中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尤为研究者所注意，涉及的方面较广，包括他们的活动和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还包括他们的文学观点、历史进化观点等等^③。除林、龚、魏外，对其他人物也做了一些研究^④。

-
-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4册；来新夏：《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彭泽益：《鸦片战争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刘大年：《鸦片战争时期的士大夫思想》，《新建设》1962年12月号；胡正恩：《鸦片战争时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8期。
- ② 王仁忱：《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社会》，《历史教学》1954年第9期；农也：《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与农民生活》，《经济研究》1956年第1期；汤象龙：《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财经科学》1957年第1期；伍丹戈：《鸦片战争前夕土地制度、剥削关系和剥削形态的变化》，《复旦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 ③ 胡思庸：《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1—2期；王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光明日报》1953年6月3日；陈胜彝：《林则徐在被遣戍期间和在此前后的思想与活动》，《历史教学》1961年第8—9期；易梦虹：《关于龚自珍的社会经济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8月28日；任访秋：《龚定庵文学略论》，《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2期；李时岳：《论龚自珍政治思想的核心及其经济改革方案》，《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杨荣国：《龚自珍思想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冯友兰：《魏源——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先进思想家》，《人民日报》1957年3月26日；陈丹阳：《试谈魏源的诗》，《光明日报》1960年4月24日；易梦虹：《魏源的经济思想》，《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吴泽：《魏源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 ④ 吴则虞：《论包世臣》，《文汇报》1962年4月13日；胡滨：《包世臣的思想》，《光明日报》1963年12月18日；胡思庸：《关天培与陈化成》，《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11期；陈胜彝：《论钱江》，《学术研究》（广东）1964年第1期；邹贯贵：《爱国者姚莹》，《合肥师院学报》1963年第1期；丁凤麟：《怎样评价鸦片战争中的海龄》，《江海学刊》1963年第12期。

还应该提到史料的收集、整理。在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有关鸦片战争史料的整理出版,成绩显著,是解放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的专题资料有《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出版)、《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个人文集有《林则徐集》(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综合性资料有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等等。后者出版于1954年(神州国光社出版,后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大型的史料汇编,为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期间的鸦片战争史研究,成绩无疑值得充分肯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不是没有不足和失误。例如在一些撰写这一事件和有关人物的出版物中,居多的是通俗性的小册子(这里没有要贬低通俗读物的意思),缺少有份量的研究性的学术著作,在有关文章中,批判性、纪念性或介绍性的文章,即便是保守的估计,也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所涉及的范围也较狭隘,事件限于讲发生、经过和结果,人物则偏重写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尤其是“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妨碍了对鸦片战争史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例如,分析英国政府和烟贩活动的文章不到十篇,而抨击美国政府及烟贩活动的文章却在十篇以上。我们并不反对研究其他国家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政策和活动,但鉴于这场战争本身爆发于中英两国之间,而英国却没有得到深入细致的考察,这种状况显然是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更为明显的事例是把强调人民群众的抗英功绩同肯定爱国官绅在这次斗争中的作用予以割裂或对立,拔高前者,贬抑后者,回避甚至抹杀爱国士绅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的领导和组织作用,等等。这种情况,反映了鸦片战争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倾向。

十年“文化革命”的大动乱,败坏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同样也败

坏了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从数量上说，建国十七年平均每年发表的有关鸦片战争史的文章在二十篇左右，而在“文革”十年间，每年仅得六、七篇。不仅如此，鸦片战争史成为江青之流搞政治阴谋的工具，被人为地纳入“儒法斗争”的轨道。在这几十篇文章中，从儒法斗争角度论述鸦片战争的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对英国侵略的历史被篡改为儒法两条路线的历史，林则徐、龚自珍、魏源被加上“法家”的称号，把他们描绘成为尊法反儒的“斗士”，历史失去了真实性，被歪曲、糟塌了。

打倒“四人帮”后，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以来，随着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流毒的深入开展，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年，不仅出版了几部较有份量的专著，还发表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从发表的数量上看，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到一九八四年十月，平均每年在五十五篇以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较为实事求是的态度，气氛活跃，思路开阔，扩展了研究的领域，从而使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水平。

篇幅较大的研究性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是近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收获，它改变了只限于通俗小册子的局面。这一类作品，有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和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前者详尽地阐述了鸦片输入过程、禁烟过程和战争过程，探讨了战争的每一阶段以至每一次主要战役在战略战术上的利弊得失，层次鲜明，脉络清楚。后者细致地描绘了这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的形象，揭示了他的成长道路和发展变化的原因，知人论世，有血有肉，性格鲜明。两书的作者都用力甚勤，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使用上，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从而使它们具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并订正了一些传统的错误说法。管林、钟贤培、陈新璋的《龚自珍研究》，则着重对龚自珍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探讨。至于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苑书义、胡思庸等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等书中关于鸦片战争的阐述,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另外,来新夏的《林则徐年谱》以年记事,条理清晰,史料丰富,也有参考价值。

在研究课题方面比以往广泛了,对所研究的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就面的开拓而言,对过去被忽视或注意不够的课题开展了研究,发表了一批可喜的成果。这些论文,有阐述鸦片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经世派以及对西方的了解^①,有探究汉学和宋学的论争^②,有研究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③,有分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④,有论述香港历史、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和香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⑤,有考查战争前后清政府财政的困难状况^⑥,等等。就战争本身来说,对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已不满足于比较笼统的结论,而是抓住清政府的战略战术变化和中英双方的兵力对比进行具体的分析^⑦。还有的文章,对

① 李佩:《鸦片战争前后“士林风气”的变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第187—206页;陈胜彝:《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2期;胡逢祥:《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世界史地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② 胡思庸:《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汤志钧:《清代经今文学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③ 何桂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西方传教士的侵华活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徐恭生:《鸦片战争期间天主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历史教学》1983年第7期;张浚哲:《法国传教士与黄埔条约》,《中国哲学》1982年第4期。

④ 来新夏、李喜所:《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⑤ 丁名楠:《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⑥ 周育民:《1840—1849年的清朝财政》,《山西经济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

⑦ 张一文:《试论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基本原因》,《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茅海建:《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某一支军队或某一个过去很少涉及的地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①。对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变化的研究,较之以往也更为细致、深入,如对在华的洋行势力、战前科学技术水平、战后新阶级的产生、经济格局、地区经济等方面进行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②。在人物研究方面,对以前论述较多的主要人物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象魏源与太平军的关系、龚自珍佛教信仰等问题,反映着研究面的扩大^③。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的研究者对林、龚、魏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试图探讨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这对于研究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无

-
- ① 沈雨吾:《一支抗英人民武装——黑水党》,《浙江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张思温:《鸦片战争中的甘军》,《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孔凡清:《清朝满蒙将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积极表现》,《荆州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卞恩才:《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安徽》,《安徽史志通讯》1983年第2期。
- ② 魏鉴勋:《清代鸦片战争前科学技术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聂宝璋:《十九世纪中叶在华洋行势力的扩张与暴力掠夺》,《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陈诗启:《论鸦片战争前的买办和近代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戴鞍钢:《五口通商后中国外贸重心的转移》,《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杨源兴:《中国五口通商时期丝茶出口贸易》,《学术研究》(广东)1984年第3期;黄逸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所处的历史阶段》,《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郑天挺:《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徐新吾:《关于鸦片战争前中国民营丝织手工工场并未存在的考证》,《学术月刊》1983年第9期;傅衣凌:《鸦片战争后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彭泽益:《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萧国亮:《鸦片战争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联系的加强》,《社会科学》(上海)1984年第1期;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 ③ 卢兴基:《龚自珍中年学佛的考察》,《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管林:《论龚自珍的佛教信仰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钟葵生:《试谈魏源与太平军的关系》,《邵阳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陈其泰:《魏源与鸦片战争史》,《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黄丽镛:《魏源与太平天国关系史实考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疑是有益的^①。除去林、龚、魏外，近年来还对那些过去注意不够的人物（包括反面人物）做了有益的研究，如邓廷桢、黄爵滋、姚莹、张穆、道光皇帝、琦善、杨芳、徐继畲、穆彰阿、徐广缙、裕谦、梁廷枋等都有专文论述^②，所涉及的人物或某一人物的方面，都比以前更广泛。

对某些史实的错误加以订正或提出怀疑，也是近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的明显成果。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数量，李伯祥等的论文作了仔细的推算，认为一些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论著在引用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统计材料时有不够确切和错误的地方，存在着偏高的情况，经过订正，鸦片进口数量，一八三〇到一八四〇年平均每年为二万四千箱，其中输入量最高的一八三八到一八三九年度为三万五千五百箱，历年白银外流的数量估计只有五、六百万两。但关于白银外流的数量，有的同志认为在战前二十年“接近一亿两左右”，甚至还有认为：“一八〇〇——一八三九年……白银外流数量至少也是……六亿两之多”^③。在此问题上所存在的歧异，有待于进一步考订核实。关于宣南诗社，过去史学界曾经长期把

① 杨国桢：《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竺柏松：《龚自珍与中日文化交流》，《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期；李汉武：《试论魏源历史观中的近代因素》，《求索》1983年第4期；李汉武：《试论魏源认识论中的近代因素》，《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② 陈致宽：《黄爵滋与禁烟运动》，《历史教学》1980年第9期；龚书铎：《姚莹交游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杨维：《论道光帝在禁烟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福建论坛》1983年第1期；邱远猷：《琦善与鸦片战争》，《中学历史教学》1981年第1期；徐公义：《鸦片战争期间的杨芳初探》，《北方论丛》1981年第3期；潘振平：《徐继畲和〈瀛环志略〉》，《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刘德鸿：《穆彰阿评价异议》，《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刘毅政：《民族英雄千古流芳——纪念蒙古族英雄裕谦抗英殉国一百四十周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丁宁、周正山：《梁廷枋与〈粤海关志〉》，《学术研究》1983年第2期。

它说成是由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在一八三〇年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一九六四年杨国桢在题为《宣南诗社与林则徐》^④的论文中否定了这种说法，指出这个诗社成立于嘉庆九年（一八〇四年），是来自南方的小京官和士大夫在京“雅歌投壶”的消闲组织，不带有进步的政治色彩，林则徐是其中成员，龚自珍、魏源、黄爵滋则不是。近年来有不少同志撰文继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更详尽地阐明宣南诗社的创立、成员和性质^⑤。关于林则徐的家庭成份，传统的说法认为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或说是出生于破落的中小地主家庭，杨国桢在《林则徐传》中对林氏家族资料作了分析研究，指出其祖父是失去土地的教书先生，父亲和伯父也都以教读为业，没有直接经营土地，应是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关于《川鼻草约》，英国侵略军于一八四一年一月强占香港时曾发布公告，诡称是经义律与琦善签订的，此后中外史籍颇多沿袭此一谬说，胡思庸、牟安世在他们的论著中，对琦善与义律在广东谈判过程的有关文献详加考订，都断定琦善始终没有在这个草约上签字^⑥。关于广州人民反抗英国强租河南地斗争的年代，林增平、廖伟章分别撰文加以辨误，据有关文献证实该事件应是发生于一八

③ 李伯祥、蔡永贵、鲍正廷：《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胡晏：《略论鸦片战争前的白银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刘鉴唐：《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④ 《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

⑤ 杨国桢：《再论宣南诗社与林则徐》，《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辑；王俊义：《关于宣南诗社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集》第1辑；黄丽镛：《宣南诗社管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樊克政：《关于宣南诗社的命名时间及其他》，《华东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陈致宽：《宣南诗社成员考异》，《光明日报》1980年10月7日。

⑥ 胡思庸、郑永福：《〈川鼻草约〉考略》，《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牟安世：《鸦片战争》。

四七年，纠正了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著述中所说的发生于一八四四年的错误^①。上述史实的订正，有利于加强鸦片战争史的科学性，也有助于加深对这段历史的研究。

注意克服片面性、简单化的偏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这几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中出现的好现象。这种良好的学风，在上述的情况中可以反映出来。这里还可略举一例来加以说明。关于三元里斗争的领导者，不少论著根据解放后的调查资料肯定是菜农韦绍光，近年来有的同志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文章认为，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否认地主阶级在当时起了组织领导作用，根据鸦片战争时的公私文献，爱国士绅何玉成应是斗争的领导人之一，而菜农韦绍光，在当时的公私文献，甚至民间歌谣中都没有片文只字的记载，不可能是领导人。文章还指出，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拔高韦绍光，抹掉何玉成，是一种唯成份论的表现^②。论者的意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于克服简单化偏向，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有益的。

史料的搜集、整理，也有一定的新进展。这主要表现在对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的文、札的辑佚和考释，其中集中的成果是杨国桢编的《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初版于一九七六年的《魏源集》（中华书局出版）在经过增补、校订之后重行印行。外文史料的翻译也受到注意，广东文史馆从《澳门月报》选译，编成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出版）一书。

① 林增平：《广州群众“反河南租地”事件年代辨误》，《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廖伟章：《广东人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反对英国租地斗争新议》，《学术研究》1979年第2期。

② 卞哲：《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读书》1979年第2期；田用：《何玉成冤词》，《史学月刊》1980年第1期；吴杰：《三元里抗英斗争组织者考》，《历史教学》1983年第3期。

二

三十五年来,鸦片战争史的研究能够有所创获,有所进展,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双百”方针的贯彻。凡是“双百”方针得到贯彻,学术气氛就活跃,研究者们就能够思想开阔,各抒己见,展开有益的讨论,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当中,不可避免的也会出现某些见解的分歧。下面就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几个主要问题做一概述。

1.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闭关政策的评价

如何评价闭关政策,这在五、六十年代就已存在着不同的看法^①,但那时持批评的意见还不多,因而分歧还不突出。粉碎“四人帮”后,尤其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对这一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意见多了起来,分歧因之明显。

一种意见认为闭关政策起了民族自卫作用,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规定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些规定并没有越出这种权利,虽然其中个别次要的规定反映了中国封建统治者落后的成见,但是当西方殖民主义者正以冒险家、海盗的身分在世界上一切他们所能到达的地区和国家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的时候,这些规定,就其主要部分来看,实在是当时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问题是,在国内以维持落后的封建生产

① 王仁忱:《明清的海禁与闭关》,《历史教学》1954年第12期;孔经纬:《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经济实质》,《理论战线》1960年第5期;《鸦片战争前中英矛盾的发展和清政府日趋严格地实行闭关政策》,《光明日报》1960年3月20日;湖北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组:《关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及其实质》,《理论战线》1960年第7、8期。

关系为任务的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把对外的自卫政策认真贯彻下去，更不可能把这种自卫政策同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结合起来^①。

另一种意见则否定闭关政策，认为这一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和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帝国政治以及蒙昧主义的产物，它严重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清政府把防卫措施同闭关政策结合起来，所以不否认闭关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间包含有一定的防卫因素。但这决非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它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中国能不能抵住外来的侵略，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离的政策^②。

上述关于闭关政策的不同意见，归纳起来，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才能有助于对这一政策作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例如，在范围上，究竟只限于中外贸易，还是涉及中外交往的一切政策和思想；在产生原因上，究竟起于外国侵略者的侵略行径，还是起于封建制度和蒙昧主义；在作用上，究竟是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遏制效果，还是促使中国不能抵抗外国的入侵。有的研究者在充分利用有关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就闭关政策的一些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述，指出清王朝禁海闭关的内容大体上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万青芝：《也谈清代的闭关政策》，《黄石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② 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胡恩庸：《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牟安世：《鸦片战争》，吴常：《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及其历史教训》，《解放军报》1979年2月10日；沈渭滨、夏林根：《清代“闭关政策”有自卫意义吗？》，《复旦学报》1979年第6期。

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对通商口岸的停闭和限制，三是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其所以实行禁海闭关，最初是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和台湾郑成功发生联系，对西方国家则采取宽大和优容的态度。促使清王朝针对西方殖民主义者采取愈来愈周密的限制措施的，是他们愈来愈嚣张的侵略活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是清王朝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限制政策的基本原因。清王朝在对外贸易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遏制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违法行为，有的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整个看来，许多限制措施和管理条例是形同虚设的。文章认为，以禁海闭关为支柱的清王朝对外贸易政策，它的目的，有防止外国侵略的一面。从这一点看，可以说有它必要的一面。而其所以可能，则是由于中国当时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我们今天评判它的是非，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而不能一概斥之为清王朝的愚昧无知和妄自尊大。如果不首先看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胡作非为，就不可能对清前期的闭关政策作出全面的评价。当然，禁海闭关，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而言，有其不利的一面。而且即使对付外国侵略，也不是有效的手段。因为西方侵略者扣击中国的大门，从一开始就在“贸易”之外，还有大炮的配合。因此，中国要抵御外国的侵略，单靠禁海闭关，也势所不能，还得在此之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闭关的一手，却缺乏同时以大炮对付外国大炮的准备。它纵能禁于一时，终究不能摒除侵略者于国门之外。从这一点看，单纯的闭关政策，是值得批判的^①。这里对闭关政策所作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将有助于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并作出全面的评价。

^① 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